

簡述南海海上瓷路

——粵港澳文物大展導讀

© 陳迎憲 / 2012.10.2



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進程中，至少有兩項產品是對世界影響至關重大的：這便是絲綢和瓷器。

中國的絲綢，自西漢始，通過河西走廊傳到中亞、南亞和西亞，再傳到歐洲，這便是被學者們命名為“絲綢之路”的陸路通道，以漢武帝在西漢建元中¹（前 139- 前 136 年間）派遣張騫出使西域作為標誌，然而直到十數年後的公元前 122 至前 117 年之“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²

漢武帝在隨後的元鼎年間（前 115 至前 111 年）南下平定南粵和閩粵兩國後，在公元前 110 年，立即開展了南海海路的開拓：“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厓郡”。³《資治通鑑》載，西漢平帝二年（公元 2 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⁴黃支國為今印度，說明西漢時期，印度和中國之間經已有自海路方面的交往。《漢書》中更說明了

¹ 《漢書》卷六十一·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² 《漢書》卷七十·傅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³ 《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⁴ 《資治通鑑》卷三十五·漢紀二十七

具體的航線：“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⁵說明了自漢武帝時期開始，黃支國和西漢之間的南海海上通道經已形成，並互有往來，西漢所派遣的黃門使者，已循南海海路經東南亞各國，到達印度洋的黃支國（印度）和已程不國（斯里蘭卡），在開通陸上“絲綢之路”的同時，也開拓了海上通道。絲綢通過陸上和海上兩個通道通往世界各地，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

瓷器對人類文明的意義

中國的瓷器生產有萬年的歷史，早在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紀至公元前十一世紀），中國便能生產出原始瓷器，在東漢（23-220）時期又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生產出成熟的青瓷。硬質瓷器的誕生，更標誌了中國瓷器以一個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眼前。如果自中國商代創燒出原始瓷來計算，中國瓷器以遙遙領先的姿態一直持續至少三千多年。從這一點來講，瓷器可稱得上是中國領先和影響世界時間最長的产品之一。

絲綢和瓷器這兩項產品孰先孰後開始外銷，我們還難以作出定論。大多數人普遍認為絲綢是在漢代、瓷器是在唐宋才對世界產生影響。而事實是：在絲綢影響世界的漢代，中國的陶瓷便已以其獨特的魅力，遠銷世界各地。

在雅加達的印度尼西亞國家博物館內，便有著豐富的中國外銷陶瓷館藏。其中最早期的藏品便自漢代始。藏品中有一件施釉博山陶薰爐，⁶與本次展覽的東漢陶薰爐有異曲同工之妙。薰爐的功能是燻蒸香料和藥材，香味可從薰爐的孔洞中溢出，達到淨室和驅除蚊蠅的作用。印度尼西亞是著名的香料之國，這件藏品來自蘇門答臘的占碑（Jambi），說明了早在漢代，中國的陶瓷已對這個萬里之遙的國度產生深遠的影響。同時該館其它藏品還來自相距數千公里外的不同島嶼，也說明了海上的民間貿易和交流，遠比我們所看到的官方古代文獻紀錄來得更多、更廣。可以說絲綢和陶瓷器至少在漢代經已開始外銷。只不過是當時的瓷器沒有如唐、宋時期產品成熟和種類繁盛，但已經是領先世界和具有獨特風格的产品，而受到各國人民的普遍喜愛。

南海：海上瓷路的主要通道

翻開中國的版圖，東、南兩方均瀕臨大海，東方的近鄰只有朝鮮、日本、琉球等數國，而在中國的南方，通過南海通道，除了聯繫東南亞諸國之外，更可經馬六甲海峽通向南亞、西亞和歐洲數百個國家。因此，大量的商貿需求來自南海，自是不爭的事實。粵港澳三地位於南海之濱，自然佔據了地利上的優勢，因此不難理解為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粵港澳可以交替互補，成為海上商貿和海上瓷路的始發港。

⁵ 《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⁶ Suwati Kartiwa, *Treasure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Jakarta*, Buku Antara Bangsa, 1997, p.99

漢代之後，三國時期的吳國，到兩晉、南北朝的南朝，以及隋朝等，均對南海貿易有所建樹。《唐六典》稱：“漢魏以降，緣邊郡國，皆有互市，與諸番交易，致其物產也。並郡縣主之，而不別置官吏。”⁷

東晉隆安年間(397-401年)，由廣州刺史掌管互市，史書載：“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特別委派吳隱之擔任刺史，吳隱之不負所託，東晉安帝喻之為：“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已潔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⁸

在南北朝的南朝梁武帝時期(522年)，“外國舶物”等事務，由南海太守管理，“州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⁹，說明海外貿易獲利之深，並已持續相當時間。

到隋朝煬帝時期(605-618年)，已有專職外夷事務的機構“四方館”之設，下設掌管互市貿易的互市監及監副：“初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後罷之，有事則置，名隸鴻臚寺，量事繁簡，臨時損益。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護錄事、叙職、叙儀、監府、監置、互市監及副、參軍各一人。錄事主綱紀。叙職掌其貴賤立功合叙者。叙儀掌小大次序。監府掌其貢獻財貨。監置掌安置其駝馬船車，并糾察非違。互市監及副，掌互市。參軍事出入交易。”¹⁰這一體制並延續到唐代。煬帝還在上任後不久的大業三年(607年)，募能通絕域者，派遣常駿、王君政等出使位於馬來半島的赤土國。¹¹

根據外國學者的研究，早在430-610年間的南北朝至隋朝，中國人便已經過南海通道直接往來於廣州到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和西瓜哇一帶從事貿易。¹²

唐代，是海上瓷路大發展的時期，特別在“安史之亂”後，陸上絲路被戰亂所阻隔，往西方的通道便為逐漸興旺和相對安全的海上通道所替代。更由於瓷器由水路運輸，較陸路具有更為便捷安全，運輸量可以更大，成本更低的優勢。同時，自南朝始至隋朝，南方瓷業逐漸興旺發展，也為唐代海上瓷路的發展奠定了產地和海外貿易在地理上的有利條件。

唐代的對外通道，根據貞元年間擔任宰相的賈耽考訂共有七條，其中海路兩條，分別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和“廣州通海夷道”。¹³“登州海

⁷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1999.12 廣東人民出版社，頁28

⁸ 《晉書》卷九十·列傳第六十，良吏傳，吳隱之

⁹ 《南史》卷五十九·列傳第四十九，王僧孺

¹⁰ 《隋書》卷二十八·志第二十三，百官下

¹¹ 《隋書》卷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七，南蠻

¹² O.W. Wolters, *Kemaharajaan Maritim SRIWIJAYA & Perniagaan Dunia Abad III – Abad VII*, Komunitas Bambu, 2011, p. 324

¹³ 《新唐書》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

行入高麗渤海道”由山東登州（今煙台）出發，沿渤海灣到達新羅、高麗、渤海三國。而“廣州通海夷道”由廣州出發，經南海到達東南亞諸國，再經馬六甲海峽，到南亞以至西亞阿拉伯諸國。其中，廣州通海夷道中所提到的共有六十三個國名和地名。從“廣州通海夷道”航道的直線走向我們可以看到，已經無須再沿海岸線行走，因而節省許多航行時間。說明當時的航海和航路的測定技術已有很大提高，中國人已掌握了觀察夜間天文星象、利用指南針和信風的幫助在南海中航行。

除了中國商人的南下遠航之外，也有大量來自東南亞、南亞和西亞的商人來華，清人梁廷柟在《粵海關誌》內述：廣州“唐始置市舶使，以嶺南帥臣監領之”。¹⁴而根據《新唐書》的記載，自唐太宗貞觀六年，便設有隸屬少府的“互市監”以掌蕃國交易之事：“互市監每監，監一人，從六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掌蕃國交易之事。隋以監隸四方館。唐隸少府。貞觀六年，改交市監曰互市監，副監曰丞，武后垂拱元年曰通市監。有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價人四人，掌固八人。”¹⁵在唐之前，對外貿易以官方的朝貢貿易為主。而到了唐代，民間的貿易有了較大的發展，朝廷允許商人在朝貢貿易之後，將剩餘的貨物賣給民間商賈，這些政策為唐代海上瓷路的發展和興旺奠定了基礎。當時的廣州設有蕃坊，供大量來華商人居停，也說明了當時政府鼓勵對外貿易的政策，而這種海外貿易也使中國瓷器對世界各國產生重要的影響。

宋代是中國瓷器外銷的又一次高潮，宋代的瓷器無論在品種和技術上都有了長足的發展，我們可以通過“南海一號”所裝載的外銷瓷看到中國的青瓷和白瓷刻花等品種，這在當時，只有中國才能生產出這種晶瑩似玉、潔白如雪的瓷器，以致於各國商人都對這種產品趨之若鶩。到了南宋時期，都城由北宋的開封，遷往東南方的臨安，即現在的杭州。在西、北兩方的強敵進逼之下和政治中心的南移，使南宋面臨只有東部和南部的海路可以對外通商。進一步促進了海上貿易的興旺發展，宋代設立了專職掌管對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在北宋和南宋時期，最多時曾各設置了七個“市舶司”，其中只有寧波、泉州和廣州實際發揮重要作用，而三個口岸中，貿易總量最大的乃是廣州港。¹⁶

從唐、宋時期，廣州就憑著南海地利的優勢，成為位列中國的第一大港，也是當時世界上最繁盛的東方商港之一，南海海上瓷路最主要的始發港。雖然到南宋末年和元朝，福建的泉州曾一度超越廣州港，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但是廣州港仍憑藉地理的優勢，保持了其重要港口的地位。

元代的海上瓷路也非常興旺，汪大淵在《島夷誌略》一書中對元代的海上瓷路有很詳細的描述。汪大淵提及的元代海上航線，共有二百一十九個國家和地名，其中有陶瓷貿易的國家和地點就有四十九個。¹⁷

明代實施海禁，停止民間對外貿易，雖然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時，瓷器是必備的“人情物件”，¹⁸被作為國禮送往沿途各國，但鄭和的海上瓷路並未對瓷器

¹⁴ 梁廷柟[清]《粵海關誌》(30卷木刻本)1839，粵東省城龍藏街業文堂，卷二，頁6

¹⁵ 《新唐書》卷四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¹⁶ 朱彧[北宋]《萍州可談》卷二

¹⁷ 汪大淵[元]《島夷誌略校釋》蘇繼庠校釋，中華書局，1981.5一版，2000.4二刷

的外銷和外貿有實質性的幫助。而海禁政策，對於自唐以來逐步興旺的民間貿易則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此時，葡萄牙人作為歐洲地理大發現的先行者，巡海路來到中國，並通過澳門，將大量的瓷器，運往歐洲。

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聖·凱特琳娜號事件。聖·凱特琳娜號是葡萄牙的商船，由澳門出發開往馬六甲，於 1603 年 2 月在南海海面遭到三艘荷蘭船隻的劫持，被送往荷蘭阿姆斯特丹，船上裝載有大量的青花瓷器，由於該款商船被誤稱為克拉克船，因此該批瓷器被稱之為“克拉克瓷”而揚名歐洲。¹⁹ 在澳門出土的大量明代中後期、乃至清初的克拉克瓷片，見證了澳門在當時南海海上瓷路的主要始發港地位。

歷史上澳門港的興衰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 黃金時期 (1535-1684)：1535 年澳門在正式成為通商港口，1554 年葡萄牙人入據澳門之後，正值明清政府實施海禁政策，澳門成為中國唯一的“化外之地”而成為中國主要的外貿港口和世界航運的樞紐港；2) 蕭條期 (1685-1840)：清政府在 1685 年廢除海禁，開放四海關，澳門海外貿易被廣州和其他港口取代；3) 衰落期 (1841-1911)：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後至清末，全國開放港口達到三十四個，澳門港的外貿地位已不再重要。²⁰

鴉片戰爭後香港被割讓給英國，成為自由港，同時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廣州的優勢被削弱。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的英國，海上航運也逐漸由鐵船代替木船，船體越造越大，吃水越來越深，澳門水域亦因海床淤塞，逐漸為香港的深水港所替代，香港亦於十九世紀末開始，逐漸成為面向南海的重要國際商港。

展覽的啟示

粵港澳三地文博合作，以海上瓷路 — 這一個聯繫三地的歷史作為展覽的主題，目的在於通過展覽向公眾展示一段令國人引以為傲的歷史。展覽的信息含量豐富，公眾可從中了解到諸如：陶瓷製作、陶瓷發展史、中外海上交通史、海外貿易史、中國海關史、水下考古、外銷瓷、外國仿製瓷等不同主題內容。

儘管如此，展覽中並沒有設計冗長的說明文字，而是充分利用了紀錄片、窯爐模型、地圖、實物、還設有立體的多媒體展示、兒童遊戲等生動的展示方式，讓參觀的人們在輕鬆的環境下感受和得到相關的知識。是一個適合學校學生、親子兒童互動教育的場所；也適合專家學者、文物愛好者進行研究、學習的地方。

與此同時，這個展覽也給觀眾帶出一個令人深省的訊息：中國的瓷器能引領世界數千年，是無數代前輩先賢的集體智慧和努力不懈的創造成果。身為具

¹⁸ 鞏珍 [明] 著《西洋番國志》，向達校，1959.2，《勅書》之三，中華書局 2006 重印，頁 10

¹⁹ Robert Finlay, “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253.

²⁰ 黃啟臣《海上絲路與廣東古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6.2，頁 84-103

有高度文明傳統的我們，能為當下和未來的世界再作出什麼樣的貢獻？希望觀眾看過展覽之後，留下一個進行思考的課題。

註：[《海上瓷路 ——粵港澳文物大展》](#)是粵港澳三地第二次文博合作大展，2012年5月至10月在澳門博物館首展，2012年11月至2013年6月在廣東省博物館展出，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在香港藝術館展出。